

說出自然的名字：臺灣博物學的輸入與建構

文／蔡思薇（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博士後研究員）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博物學是寬鬆的定義

在過去沒有網路的時代，人類究竟如何了解世界，搜索奇事異物？又如何解決對世界的疑惑？人類對自然的追尋，便是「博物學」重要的源頭之一。博物學是無法定義的廣泛概念，它可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可以是蒐羅奇珍、知學書畫。博物學可以是菁英之間的知識交流，也可以作為庶民傳說集大成的採集流傳，無法化約等於科學。

有關於臺灣博物學的誕生，有兩個較為顯著的面向。一為與中國博物學相關的概念，例如中國志書中的天文地理、本草學的花草果木、鳥獸蟲魚、鉛錫汞等，以及蒐集大地萬物的各類民間流傳與藥典。這些中國清代以前的紀錄，或多或少也書寫下臺灣當時的物產及自然環境。另一則是與中國博物學的脈絡與不同的西方博物學，即現今我們所熟知的博物學。

接受西方知識的傳教士馬偕，在清末中西學問撞擊於亞洲的時代來臺，曾寫出他的觀察：「臺灣的自然博物史至今尚未被記載於書本。甚至最權威的記述，其所提供的資訊也是極貧乏而



▲《臺灣府志》中有關「蕃社風俗」之記載。

不可靠。任何所謂是中國科學的東西，都是只憑經驗而來，因此必須再加以過濾。外國科學家則很少對臺灣做過調查。然而臺灣博物史是個很重要的主題，不可忽視。……」馬偕的話可說是首次正式在臺灣出現的「西方VS. 中國」之間的博物學觀察。不論馬偕為何如此表達，我們都不能否認，當時

馬偕接受的博物學概念，是另一種影響往後臺灣博物學架構甚深的西方式博物學系統。

「博物學」也可以翻譯為「自然史」(Nature History)。嚴格來說，西方博物學歷經了多次蛻變，從探索上帝創造萬物在自然中的規則，發展至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變化之劇烈已非一言可盡。隨著科學方法、理論發展、實驗技術驗證、探險遠征等百家爭鳴的推波助瀾下，西方博物學漸漸發展為越來越精準的學科知識；然而，雖然博物學發展分工變得細緻且越來越走向專業化，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博物學一直以來都有非常強大的「從自身周邊觀察」的出發點，因此，「博物學」本身在任何時期都含有許多複雜且模糊的邊界。



▲英國博物學家卯和於1858年來臺旅行之際所繪。

日本對臺灣博物學的影響

在清代中國式的博物學之後，臺灣的博物學透過西方外國傳教士、海關職員，以及後來全盤西化的日本，這幾類與臺灣接觸與統治的因素下，逐步走向西方博物學並深受影響，尤以日本影響最深。

日本對臺灣最早的博物學紀錄，可追溯至1870年代因牡丹社事件關係，栗田萬次郎在隨軍期間記錄並採集臺灣南部所見植物，隨後發表於日本的《植物學雜誌》；以及1880年代日本軍醫落和泰藏記載臺灣南部原住民的風俗、民族植物、動物與傳說等。此時的日本，也正經歷傳統本草學與西方博物學融合交錯的時期，使得本時期日本留下混雜西方「田野筆記」、「目錄」的博物紀錄，仍帶有日本傳統博物風格。

隨著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日本礙於統治急迫，急欲解明臺灣各地的風土民情、資源，許多各地的官員、顧問展開了各類調查。這些調查在現在看來，顯得非常「多元」，不一定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統一的風格，資訊不甚正確，帶有異國風情，

甚至明顯的會隨著調查者的喜好、興趣而有不同偏好紀錄。這些在地的總督府官員或囑託，比1896-1900年間東京帝國大學各隊人馬來臺所留下的紀錄更多，他們在殖民地調查的第一時間寫下作為「博物學者」的觀察，例如田代安定、米元長治、石井八萬次郎、八戶道雄、鳥居龍藏、藤根吉春等，紀錄常常是人種、地理、物產、人口、動植物或地質等各類有用資訊的綜合並陳。

博物館真的誕生了嗎？

「博物館」作為一種知識場所，在現今已是普遍的存在。這樣的觀念亦源自西方的博物館概念。或者我們用更嚴格的定義：「自然史博物館」是帶有強烈的分類、傳遞文明，甚至霸權取向。

臺灣第一座名為「博物館」的場所，1901年出現於臺南，名為「臺南縣博物館」。從其博物館規程第二條，可以看到其博物館內的「藏品」及其定位的性質：「本館為蒐集古今內外物品及圖書紀錄，以供眾人觀覽，誘發啟蒙智識為目的。」陳列區分為「五區一室」，共分為教育品、農業品、工業品、商業品、參考品及圖書記錄室。從



▲鳥居龍藏、中島藤太郎著《人類學寫真集—臺灣紅頭嶼之部》封面及內頁。

分類內容可以看到，「臺南縣博物館」一部分仍偏於收藏舊式珍品，如圖書、文物，其他則以物產、商業貿易品為主，不是我們熟知的典型博物館。直到1908年，總督府成立「殖產局博物館」，從成立的訓令八十三號中，可以看到有關博物館的宗旨：「掌理蒐集陳列有關本島學術、技藝及產業所需之標本及參考品，以供公眾閱讀之事務。」在第七條管理規則中，寫博物館共分為：「地質、礦物、植物、動物、人類（蕃族）、歷史及教育、農業、林業、水產、礦業、工藝、貿易十二部。」這是第一次清楚確立西方博物學所包含的自然與分類概念的臺灣機構。

除了上述總督府官員、博物館之外，與臺灣博物學研究相關的還有「國語學校」教師。有別於因軍事因素來臺，或者具有博物學熱誠而負責地方事務的官員，國語學校的教師們接受基礎生物學教育，並通過教員考試，成為另一種在臺灣的博物學者。例如1896年即擔任教諭的栗野傳之丞、新家鶴七郎，以及較為人所熟知的伊能嘉矩，至後

來的永澤定一、岡本要八郎、相馬禎三郎、堀川安市等，都為臺灣的博物學建立基礎。

博物學的黃金時代

1910年代可以說是臺灣博物學的黃金年代，上述各類機構中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加上殖民政府所建立的教育系統漸漸深入臺灣各地。不論是「愛好自然」的學校師生，或者因興趣、科學交流、訊息交換為目的的人蔚然浮現。1910年12月，總督府博物館館長川上瀧彌發起組成「臺灣博物學會」，發起者不純然是總督府殖產局及博物館系統的人員。例如，發起者中有採集蕨類植物著名的國語學校助教授相馬禎三郎、因白蟻侵蝕木造建築嚴重而被土木局聘攬研究白蟻的大島正滿，以及擔任中學校教諭，即將赴美進修動物學的木村德藏等人。該學會的學會規則第二條，清楚定義了臺灣博物學會的目的為：「下列諸學科，特別是以與臺灣有關的事項進行調查的動物、植物、礦物、人類學、地質學、氣象學等。」每月舉行一次月會，每年一月舉辦總會，並創立期刊《臺灣博物學會會報》(The Journal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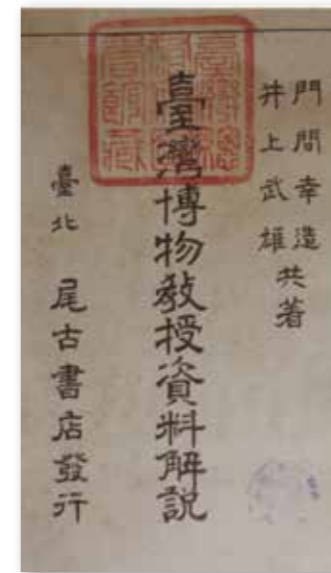
臺灣博物學會的成立，可說是完全模仿西方科學氛圍與方法的組織，會員除了定期聚會、舉辦戶外採集旅行，廣泛標本的蒐集、交換彼此意見，並發行期刊。其

中期刊的發行，不僅使得與博物學相關的議題從此不再分散於農業、教育等雜誌；從博物學在臺灣萌芽的歷史來看，亦可集合不同背景的博物學者，產生更寬廣、綜合性討論的可能。期刊內容除了有各類生物學研究成果、目錄發表外，也常有記載臺灣地方習俗、方言與博物學之間的研究，並附有海內外博物學者新聞、會員動態、新書通知等。

有別於日本的博物學在1880年代已經出現專業分工的學會，如「東京動物學會」、「日本地學會」等細分的組織，臺灣博物學會的組成及期刊內容，也反映出殖民地臺灣的特殊性。除科學研究交流外，臺灣博物學會強調田野與觀察的氣氛熱烈，不僅是臺灣愛好博物學的菁英知識群體，同時也建立出迥異以往，新的博物學氣氛。隨著會長替換，會址隨之更迭，《臺灣博物學會會報》自1911年3月創刊，到1945年2月停刊，總計發行34卷252號。

臺灣博物學的獨特性

在臺灣博物學發展過程中，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是臺灣知識走向專業化的象徵。此時，日本人擁有的臺灣各類博物學資訊，已經比三十多年前初統治臺灣時來得豐富且更有系統，整體生物學科也有大幅度的細緻專業分工。雖然在基礎的中學校及師範學校



▲《臺灣博物教授資料解說》書名頁

中，博物學仍是「理科」、「生物學」、「自然知識」的代名詞，但在大學已經無法用「博物學」來含括一切。1922年出版的《臺灣博物教授資料解說》，就是為了在臺教授博物學的教師們所編著，具有臺灣生物特色的手冊，也顯示出臺灣博物學擁有的熱帶性格，一直以來無法簡化與日本博物學併合的特色。

至於博物學研究者，大正、昭和時期，臺灣的博物學還是以日本人研究者占大多數。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排除臺灣人就讀理科，實際上仍有明顯的界線，原為雇員，後成為臺南師範學校博物學者牧茂市郎助手的王雨卿一類的臺灣人從事博物學，仍是少數。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臺灣教育機構及各類生物研究、試驗機構的健全，所培育出的研究者漸漸不全是日本母國學校系統培養出的研究者，而是出生在臺灣，接受臺灣教育，或因在臺灣長期工作而茁壯的殖民地博物學者，例如佐佐木舜一、澤田桂吉（澤田兼吉之子）、萱嶋泉等。

戰後，臺灣的博物學又一次接收中國的博物學者，此時，中國學者已是接收西方科學思想的一代，觀察他們在日本建立的臺灣博物學基礎下，如何研究、繼受或批判，是現代回思臺灣博物學建構中持續的工作。☞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左)、1912年臺灣博物學會會員名錄(右)。